

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 百年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

沈铭辉 秦升*

摘要 百年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变量是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从20世纪末至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综合经济实力大幅上升，在经济规模上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经济规模对比的变化必然带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上升，从而改变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大变局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制度变革与更新，都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对发展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变局中，既有乱局之扰、困局之难，也是布局之时、破局之机。对中国而言，只有把握好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两个关键变量，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大变革与大发展。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制度革新 战略竞争 实力对比

* 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秦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在新时期对国际格局、世界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近十年来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显著提升，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变量直接影响大变局的变化程度和变化方向。另一方面，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诉求上的差异不断凸显，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分歧不断加大，由发达国家建立并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面临着变革和更新的迫切需要。本文分析了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在大变局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明确了中国在大变局中遇到的挑战，为中国未来更好的理解大变局、利用大变局、影响大变局提供政策建议。

一、经济全球化推动新兴经济体进入发展快车道

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经济优势，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经过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得到加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彻底确立。通过工业革命及与之同步发展的军事技术革命，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领域掌握了世界的主导权与话语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日本成功跻身“列强”以外，广大非西方世界仍普遍处于半独立、被压迫、被殖民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掌握了世界金融权力，形成以美国为核心，日欧等发达国家次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核心—边缘”（沃勒斯坦语）结构。按照“核心—边缘”的理论，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

中控制了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因而位于核心区，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为获得发展资源而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区。直至1960年以前，发达国家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一直维持在70%以上，在资本和技术领域的优势更加明显。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先后实现建立福利国家的目标，部分生产环节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与资本贸易条件的改善逐渐外移。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看，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单纯的逐利行为，生产、技术与贸易的转移也是追求利润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恰恰是因其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与发达国家的逐利目标在一定时期内相吻合。

首先，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的民族解放浪潮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走上发展正轨，国内环境能满足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如提供义务教育和基本的基础设施等。合格又廉价的劳动力只能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找到，这是制造业和制造相关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强了资本、生产与贸易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形成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为推手，在深化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使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受益，但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受益更多。

资本和技术与生产环节同向移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快速增长，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率先获得较大发展。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与印度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乘势进行经济改革，努力融入世界经济与贸易体

系，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加速。

从总量上看，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根据世界银行 2017 年公布的数据，2016 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 54%，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65% 以上。其中，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尤其亮眼：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 2018 年经济总量达到 13.6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6%，印度自 2015 年以来连续三年取得 7% 以上经济增长，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2018 年印度 GDP 约为 2.7 万亿美元。除了中印，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近些年的经济成就也令人瞩目。

俄罗斯、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家近几年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经历了起伏，但其潜在增长率高，在中长期仍有巨大发展潜力。由于基本面较为稳健，亚洲新兴市场相对其他拉美及中东等新兴市场来说，整体韧性较强。2018 年东亚国家经济增速为 6%，南亚国家经济增速达 7.1%，其中，东盟经济增长受到基建投资及强劲内需支撑，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2018 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率 5.17%，成为东盟十国中首个 GDP 超万亿美元国家；泰国增长率 4.1%，GDP 首次突破 5000 亿美元；越南和菲律宾总量相对较小，但 2018 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7.08% 和 6.2%，发展势头较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19 年东南亚国家也将保持较高增速，经济增长将达到 5.1%。

发达国家方面，受减税政策与金融市场等因素影响，2018 年美国 GDP 增长近 3%，首次超过 20 万亿美元大关，但其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已经从二战后的近 60%、1960 年的 40% 下降到 2018 年的 24%，美国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长期占有的支配地位发生了动摇。此外，短期政

策刺激的效果将在今后几年逐渐消退，美国经济增长的后劲仍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19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为 2.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预计在 2020 年美国 GDP 增速将从目前的 3.0% 放缓至略高于 2.0% 的水平。欧盟与日本近年来的经济情况乏善可陈，其中欧盟，特别是欧元区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验，欧盟作为曾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样板”，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而日本经济则受到结构性问题困扰，人口规模下降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无法解决，未来增长预期难言乐观。

二、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构成百年变局的基础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特别是以中印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至世纪之交时，发达国家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下降到 60% 左右。201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进入“从量变到质变”阶段。1970 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近 4 倍于外国直接投资；但到 2016 年，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援助金额 4 倍。与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相伴的是贸易，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 年发达国家在全球有形产品贸易中的比重是 73%，发展中国家仅占 27%，而到 2017 年，这一比例变为发达国家占 48%，发展中国家占 52%。如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援助的依赖关系已经终结，外来直接投资取代援助，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0 年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变化愈发明显，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联合

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高盛、普华永道等知名咨询公司，纷纷发布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预测的时间节点通常选择在 2030 年与 2050 年。两个时间节点的选取主要是出于全球经济排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考虑。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 2030 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将在 2050 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世界经济中长期预测指标性意义，同时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也将具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潜力。

2030 年，世界经济版图很可能因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交接”而发生改变。根据 2019 年世界银行报告发布的数据，中国和美国两国拥有世界 23.1% 的人口，GDP 合计占全球的 40.2%，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美两国将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 52.7% 的力量。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天平已经“缓缓地朝正强势崛起的中国倾斜”。其实，自 2015 年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就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在 2014 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虽然购买力平价指数的经济学意义仍存在争议，但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近 20 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积累的“量变”动能，迟早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产生“质变”的作用。

普华永道根据其在 2006 年开发的长期全球经济增长模型，在 2017 年发布了《长远前景：2050 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根据这一研究，2050 年中国、美国与印度会牢牢占据全球经济前三强的位置，并与其他国家拉开明显差距。同时，印度尼西亚将会超越日

本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 11 个经济体中有 6 个是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到 2050 年，虽然部分国家面临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一个被各类预测普遍承认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力量将会持续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普华永道的这一预测虽然在具体排名上与其他预测有所出入，但 2050 年中美印将成为全球经济前三强的结论却是各类预测的共识。

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未来 30 年中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国内改革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巴西、土耳其和越南等，另一个是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完成存在不确定性，而工业化的实现是一国真正变强的标志，也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的基础。自互联网技术面世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人工智能、新材料、可再生能源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新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给传统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运用新技术和适应新模式的难度。以智能化、个性化、小型化、分散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以劳动密集、资本集约、生产标准化为特征的“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当前全球化所依赖的国际分工模式受到挑战。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面临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就遭遇新技术挑战的局面，这既是机遇，更蕴含危险。高盛 2016 年发布的预测报告认为，从现在到 2050 年，越南将会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有望跻身全球经济 20 强，但这一预测是建立在越南能够获得国企改革成功、

避开债务陷阱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根据 2018 年的数据，越南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国内改革遭遇“瓶颈”，依赖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受到质疑。巴西经济自 2014 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来持续疲软，经济上出现“逆工业化”趋势，若要在 2050 年跻身世界主要经济体行列，就需要在近年克服这些困难。2003 年至 2017 年间，土耳其经济表现亮眼，名义 GDP 增长 231% 至 7695 亿美元，人均 GDP 增长 176% 至 9647 美元，许多研究机构把土耳其看作新兴经济体的表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土耳其若能维持政局稳定并顺利推行经济改革，其经济总量有望在 2030 年前超越意大利。然而 2018 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陡然升高，债务水平高，汇率波动加大，国家经济发展出现较大不确定性。

从长期看，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一样，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来自普华永道的报告预测，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到 2020 年将放缓至 2.7%，2030 年 2.5% 以及 2040 年的 2.5%。^① 出现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因其经济结构逐渐成熟，在经历高增长后回归自然增长水平；另一方面是多数发达经济体及部分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都将面对劳动人口显著下降与领取福利人口大幅上升的局面，“未富先老”有可能威胁发展中国家增长的长期前景。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发达经济体在资金、技术和制度上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有人口、市场与发展潜力优势。虽然新兴经济体就个体看来面临一些挑战与不确

^① 参见普华永道报告《长远前景：2050 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

定性，但作为一个整体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普华永道报告预测到2042年，全球经济总量将会比2016年翻一番，在此期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1.6%，而发展中经济体为3.3%，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七国能达到3.5%。到2050年，这七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近一半，而传统七国集团（G7）国家的占比将缩减至20%。

三、经济实力对比的历史性变化要求 国际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更新

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优势以及经济实力的历史性变化，将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挑战。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国际经济制度由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创立并发展，无论在功能上还是目标上都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特别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二战后最为重要的国际制度之一。^①

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使国际分工的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各国开放程度的加大也在逐渐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这为生产和服务的外包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便利的政策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

^① 二战后，针对全球贸易、金融和战后重建等，在美国的主导下创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三大多边组织，奠定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多边是相对单边、诸边、区域来说的。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刘建飞《简析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化进程，确保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国际贸易的高速发展。但自 2018 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呼声就不断高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是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多边体制变革的一个缩影。

(一) 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危机

在长达十年的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Roberto Azevêdo) 曾表示“世界贸易组织处于最严峻的境地”。^① 相比之下，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所面临境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是解决争端的上诉机构新法官任命受阻，可能导致世界贸易组织运转失灵。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其最大的不同是具有了管理、协调和裁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功能。解决贸易争端功能被认为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牙齿”，体现了世界贸易组织所具有的权威性、法律性和强制性。争端解决的上诉机构常设法官七位，但 2017 年以来由于美国从程序上阻挠新法官的任命，导致目前该机构正式法官仅剩三位，这是规定保持有效听证和裁决的最低法官人数。2019 年 12 月 10 日，三位法官中的两人任期将尽，如果不能填补空缺，上诉机构将陷于瘫痪的局面，世界贸易组织将丧失争端解决功能。

二是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威胁和单边主义行动对世界贸易组织构成的冲击。特朗普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贸易协定没有让美国获得多少利益，反而为外国商品占据美国国内市场提供了机会。特朗

^① Emily Jones, “How should the WTO reform itself?” *World Economic Forum*, October 24, 2014.

普威胁，他将向把生产活动转移出美国的企业征税，如果世界贸易组织阻止，则美国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在 2017 年 4 月的总统令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不再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贸易规则束缚，转而寻求单方面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征收较高的制裁关税。特朗普上任以来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多，还以国家安全名义发起了“232”“201”和“301”调查等，尤其以保护知识产权为重点，抛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发起“301 调查”。美国是二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创建者和推动者，现在转而成为其阻碍者，而且其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是对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严重冲击。

三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大量出现有导致世界贸易组织边缘化的危险。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开始迅猛增加，这是 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截至 2019 年 1 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 467 个区域贸易协定中有 291 个已经生效，绝大多数是近十年出现的，其中自由贸易协定约占 85% 以上。^① 大量自由贸易协定的存在使世界贸易组织有边缘化的危险：越来越多的贸易是在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完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不仅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而且还包括投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等超世界贸易组织条款，无形中降低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吸引力；近年来类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自贸区（FTAA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① RTA Database,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资伙伴协定 (TTIP) ” 等巨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有增加趋势, 这些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在规模和地缘政治经济影响上远超一般的自由贸易协定, 它们一旦达成, 世界贸易组织将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二) 多重矛盾叠加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呼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出现, 但其诉求只是某些具体规则的改变。相比之下, 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呼声更为强烈, 其诉求更趋于全局性或根本性改变。从百年大变局的视角来看, 这是世界经济根本性矛盾的累积和叠加的结果。

一是中美之间多重矛盾叠加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成为热点。从全世界来看, 经济方面, 中美两国同其他国家的距离不断加大, 中美两国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 如果中美分别保持 6% 和 2% 的年增长率, 那么中国的名义 GDP 将于 2030 年超过美国; 如果分别保持 5% 和 3% 的年增长率, 那么中国将于 2040 年超过美国。^① 由此, 从美国来看, 中国可能挑战其一直以来的霸权地位, 在此背景下, “修昔底德陷阱” “新冷战” 等热议不断。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始于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公开表示,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 而美国是受害者。为了遏制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降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 美国不顾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向中国发起贸易战, 甚至不惜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对者。

二是发展中国家 “群体性崛起” 导致南北矛盾出现新变化。进入

^① C. Fred Burgst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Conflict and Systemic Competition,” *Policy Brief*, No. 18-21, Peterson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1 世纪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较快增长，与发达国家低迷的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南北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趋势及其引发的实力变化必然反映到国际规则体系上。突出的例子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的建立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出现，表明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地区问题和重大国际问题上增强话语权。世界贸易组织脱胎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其重大事项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如今随着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力量壮大，世界贸易组织决策背后的力量结构发生改变。这也导致世界贸易组织难以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达成一致。

三是全球价值链兴起导致传统贸易规则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传统贸易形式是最终商品的交换，而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导致中间品贸易大量出现。基于现代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可以把一件产品的生产过程分为不同环节，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放到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完成。这样一组国家就构成一条生产链，中间商品和零部件需要多次进出生产链上的各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商品和越来越多国家加入，以及越来越细化的生产过程，全球价值链具有了自我强化的功能，形成了由点到线到网络的发展局面。传统贸易的贸易规则主要针对的是边境上的最终商品，这难以适应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大量中间商品进出边境的需求。进一步，基于全球生产链，还有大量的劳务、技术、信息和资本的流动，这些新变化要求边境后规则的协调和统一。反观世界贸易组织，尽管一些成员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方面的议题，但世界贸易组织却迟迟没有纳入，在原有的一些议题上也不能达成一致。

从上述根本性矛盾来看，当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需要的不是局

部的小修小补，而是整体规则的系统性更新。2019 年 3 月 1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9 年贸易政策议程及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提到，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建议是：（1）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制定新的多边规则解决非市场经济的挑战；（2）强调改革争端解决机制；（3）提高透明度；（4）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待遇问题。同期，欧盟、日本，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目前来看，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面临国家间力量结构、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需要从百年大变局的高度来审视和思考。

四、中国在大变局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反全球化浪潮和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

（一）反全球化冲击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对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造成重大影响。投资方面，考虑到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以及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的风险，企业的跨国投资以及跨境银行放贷都出现了大幅萎缩，2007—2017 年的十年间，跨境资本流动的总规模下降了 65%。^① 贸易方面，自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多边谈判陷入停滞状态，多边框架内的发达国家反全球

^① 肖恩·唐南，《金融全球化的退潮：跨境资本流动减少》，FT 中文网，2017 年 8 月 28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4001>。

化呼声日益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美两国是百年来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英国却在全民公投后陷入脱欧“泥沼”，美国也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展现了其藐视多边贸易安排的政策取向，向中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动多个领域的贸易战，全球价值链的制度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未曾想到的削弱。

2016年是反全球化运动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年，过去反全球化主要由底层弱势群体和持不同立场者构成，而此后的突出表现是主流人群和政治精英的加入。其背后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本国产业“空心化”、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泛起。这导致西方国家在面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时，政策趋向于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在欧洲，欧债危机和外来移民问题的发酵导致英国脱欧，并引发连锁反应，对一直走在区域一体化前列的欧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通过比较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经济成长和技术进步，同时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投资和贸易发展。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超过美国、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对依靠改革开放实现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全球化进程受阻必然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为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面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必须有所应对。

一方面，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特别是积极推动多边贸易框架的完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

营造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为契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为目标，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各方参与、着力发展的新型全球化平台，弥补传统多边贸易体系的不足。

(二) 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竞争加剧

第一，决定国家前途的科技发展战略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国家的前途。所有的内政外交都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取决于生产力和技术创新。各国都在出台各种各样的科技发展战略，争夺科技制高点，如“中国制造 2025”、德国工业 4.0、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等等，各国能否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勇立潮头取决于各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因而中国在科技发展战略的执行上要坚定不移，避免干扰，不能为外部声音左右。

第二，发展理念的竞争。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向全世界证明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复制，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普世“药方”只能是一厢情愿。与“华盛顿共识”的僵硬、教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所倡导的以体制创新、大胆实践、循序渐进为特点的发展理念更加开放和多元。对中国而言，需要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把西方国家百年来发展的成功经验纳入中国的发展理念，增强发展模式的包容性，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借鉴。

第三，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热点问题出现

的第三国竞争日趋激烈。2014 年中日钓鱼岛争端，2016 年韩国“萨德”部署事件，2018 年澳大利亚的黄向墨和 Huawei 事件以及 2018 年加拿大孟晚舟事件，这一系列热点问题表明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下，中美围绕第三国所出现的矛盾日益成为焦点。这些国家通常既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又是中国的经济伙伴，他们在美国遏制中国和打压中国时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急需做好第三国的预防战略研究，如果能够在中美竞争中赢得第三国，国际“朋友圈”就能更加稳固，中国也能收获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四，经济外交的战略竞争。目前，世界大国都根据自身对地区和世界发展态势的理解提出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战略，这种态势直接取代了全球化进程中以地区主义和地区合作为主导的对外战略，各个国家开始回归自我，包括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印度的“东方行动”计划、美国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还有美日澳印共同提出的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太战略”。这些战略代表着各个国家对自身、对未来以及对其他国家的独特认知，是各国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战略竞争的加剧反映了世界各国在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中所形成的实力与利益稳态正在被打破，东西方之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各个利益集团内部对于构建国际秩序的路线图和理念都产生了分歧。对此，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该设想既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引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思想源泉，也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

五、和合共生

2017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 “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文明冲突、全球治理、贸易规则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使得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交替上升。当今世界之“危”在于某些国家抛弃共同责任向一己之利回归所导致的分歧和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正在从以规则为主的合作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竞争转换；当今世界之“机”在于各个国家的发展相互关联、命运深度绑定，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在增加。只有深刻领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大变局中把握机遇、主动应对、创造辉煌。